



“把事了结，大家心里都踏实”

走进人民法庭

□ 本报记者 张冲

北疆守善治，枫桥润黑土。今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命名首批100个“枫桥式人民法庭”，黑龙江省肇源县人民法院新站人民法庭、鸡东县人民法院鸡林人民法庭、绥化人民法院嘉荫人民法庭名列其中。

三家法庭扎根松嫩原野，边境村寨，民族聚居一线，紧扣龙江地域特色与乡土民情，坚持抓早抓小、就地解纷，将司法服务延伸至田间炕头，基层法庭兼顾乡土习俗、边疆治理与群众诉求，以柔性调解化解邻里琐事、民生纠纷，用心践行司法为民，把矛盾化解在基层，用公平正义守护黑土平安，筑牢北疆基层治理坚实防线。

驿站文化赋能调解

位于大庆市肇源县西北部的新站镇有着数百年驿站文化积淀，曾是南北商旅往来的重要中转站。多年来，扎根在此的新站法庭坚持深挖地域文化富矿，加强外部协同联动，深度融入城乡基层治理体系，让“小法庭”发挥“大作用”。

“国子、伟子，还记得你们小时候互相帮对方打水吗？那年大雪封门，伟子爹还把最后半袋粮分给国子家一半……”今年7月16日，在新站法庭联合古驿站成立的“驿站调解工作室”内，驿站乡贤正在配合法官耐心调和刘某伟与付某国两家的宅基地纠纷。

原来，村民付某国翻建老房时向东延伸了2.5米，占用了刘某伟家祖辈使用的土地。由于老宅基地无土地证，界线仅靠习惯认定，双方争执不下，矛盾逐渐激化。

面对棘手难题，新站法庭以党建引领破局，联合村党支部主动介入，同时邀请德高望重的乡贤参与调解，听着乡贤讲述着祖辈往事，付某国、刘某伟回想起儿时情谊，当场相互致歉、握手言和。

这场纠纷的妥善化解，得益于新站法庭将驿站文化赋能调解工作，创新运用“驿站调解”工作法，邀请人熟地熟有威望的乡贤参与调解，在家长里短中将法条转化为村民能听懂的道理，把矛盾纠纷化解在一线。

新站法庭庭长郑素告诉《法治日报》记者，新站法庭管辖40个行政村及社区，农业生产、土地承包等涉“三农”纠纷时有发生。农忙时节，法庭将工作地点“定位”到田间地头，土地承包、农资买卖等纠纷实现当场化解。运用案例库检索示范性类案，开展巡回审判，送法进村屯，诉讼服务满意度好评率持续攀升，收到的每一面锦旗，是群众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的认可。自2023年以来，新站法庭平均结案时间低于30天，一审服判息诉率达96.69%——这份成绩单背后，是新站法庭各项举措的扎实落地。

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案例又更新了。”鸡林法庭在面向街道一侧，竖立了10块人民法院案例库展板，每块展板上的案例用汉语和朝鲜语双语书写。鸡林法庭与鸡林乡综治中心前后院相邻，中间这条路是两单位共建的“法治民心路”，沿着此街道前往鸡林朝鲜族乡综治中心的朝鲜族群众，将案例记在心里，作为解纷“参照系”。

“‘双语、家事’审判是法庭品牌，鸡林法庭庭长吕仙华是县、乡综治中心‘平安大姐’。她到综治中心轮驻时，群众来得勤、电话打得多。”鸡东县法院院长李宝东说。据了解，吕仙华创立的“情感评估+心理疏导”双轨模式，成功帮助38个濒临破碎家庭重建信任，民事案件调解、撤诉结案超过80%。

今年1月4日，新年上班第一天，朝鲜族居民詹家的三姐妹来到鸡林法庭，紧紧握住吕仙华和鸡林法庭庭副庭长张信铭的手，将一面写有



图① 嘉荫法庭庭长李娜在玉米地收割机旁调解纠纷。 本报记者 张冲 摄



图② 鸡林法庭庭长吕仙华到鸡林乡东兴村朝鲜族村民家中释法说理。 王亚新 摄



图③ 新站法庭干警在石油井架下调解职工劳务合同纠纷。 樊悦 摄



“司法为民 尽心尽责”的锦旗送到两位法官手中。

原来，詹家三姐妹父母去世后，留下房产、存款及黄金首饰等遗产。因遗产分割意见不合，三姐妹产生矛盾，诉至法院，承办法官认为继承案件判决容易，修复亲情难，坚持调解优先，调解结合，力争根源化解纠纷。庭审前，法官多次分别和她们进行沟通，了解到矛盾产生的根源多是过往心结未解，加上对继承相关的法律规定不熟悉，并非单纯争产。两次庭审中，法官依法组织举证质证，利用间隙讲解民法典法定继承规定，唤起姐妹情谊。

经耐心调解，三姐妹心结逐步被解开，达成遗产分割协议。为保障协议履行，两位法官陪同当事人前往金店，现场估价变卖黄金首饰，当场分割款项，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吕仙华介绍说，鸡林法庭辖区内有二个朝鲜族乡，14个朝鲜族聚居村落，法庭立足边疆民族地区实际，传承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朝汉双语家事审判为核心品牌，组建“金达莱”民俗调解队，吸纳14名朝鲜族村妇联主席担任家事调查员，出台《双语家事审判规程》，走出了一条民族团结与司法治理深度融合的特色发展路径。

实质化解矛盾纠纷

嘉荫法庭坐落于黑龙江中段南岸，小兴安

岭东北麓，与俄罗斯隔黑龙江相望，是名副其实的边境法庭。

“12年了，终于拿到产权证了，‘党员娜姐’真办实事。”今年9月23日，嘉荫农场双兴社区对人民调解员进行法律业务培训，农场退休职工樊大叔翻开不动产权证证书，激动地说。

他口中的“党员娜姐”便是当天培训课堂的主讲人，嘉荫法庭庭长李娜。李娜向记者讲起了樊大叔的“跨国调解”一案。

此前，樊大叔的儿子为父亲购买了双兴社区一套住房，岂料交易不久，一身外债的卖房人张某便失联了，房产还没来得及办理过户手续。

2025年，无奈的樊大叔来到了嘉荫法庭起诉。张某为什么不接电话，人在哪里？李娜试图“因为房子的事，樊大叔头发都愁白了，您劝一劝张某，到法庭来解决问题，谁不想住个

踏实房子。”李娜对张某亲友苦口劝说。

终于有一天，在李娜的不断努力下，失联许久的张某主动电话联系法院，说自己在外地打工给妻子治病，实在抽不出时间到法庭处理纠纷。

李娜经征求当事人同意，法庭委托特邀调解员调解本案。原告樊大叔的儿子在韩国，被告张某在外地务工，樊大叔在双兴社区的家中，可同时登录“龙法”和“系统参加”云调解。

“合同没有约定过户时间，双方都有责任。都是农场职工，都往前推一步，把事了结，大家心里都踏实。”调解员讲法说理用情。

“现在可以异地提交过户手续。”对双方当事人提出的要求，不动产登记工作人员在线解答相关政策。一切问题都有了答案，双方当事人经协商达成了和解协议。两周后，樊大叔收到了变更后的不动产权证书。

据了解，为切实打通司法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精准化解基层各类矛盾纠纷，嘉荫法庭因地制宜优化工作方式，深入田间地头，远赴千里跨省调解纠纷，以“求极致”精神做实矛盾纠纷实质化解，四年内受理的469起民事纠纷均调解结案，实现了零信访、零暴力犯罪、零“民转刑”，嘉荫农场也成为黑龙江首个“无讼农场”。

制图/高岳

点评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王启胜：

黑龙江边境线长2981公里，辖区内设有我国最北、最东法庭；这里既是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也是践行“两山”理念的重要实践地。全省381个人民法庭立足边疆特色与黑土民情，做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群众“践”行“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政治忠诚。全省人民法庭聚焦职能作用发挥，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依托“一村一法官”“四所一庭一中心”等机制一体发力，突出培育“一法庭一品牌”，构建起具有龙江辨识度的“域域枫桥”司法服务网络，涌现出“金桂兰民生审判”“萧乡调解”“雷乡邮法官”“田间法庭”等特色解纷模式，推动矛盾纠纷化解在田间地头，老百姓“家门口”，全力护航中国“大粮仓”粮安天下，服务冰雪旅游和向北开放大局。

此次入选首批“枫桥式人民法庭”的嘉荫、新站、鸡林三家法庭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嘉荫法庭发扬北大荒精神，100%实质化解矛盾纠纷，将案结事了人和送到群众心坎上；新站法庭传承铁人精神，深挖古驿站“以和为贵”底蕴，让红色基因、乡土文化与现代法治同频共振，让纠纷不出“鱼米之乡”，为东北最大粮食物流基地营造优良法治环境；鸡林法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创设“双语家事审判”品牌，倾情守护东北边疆“民族之乡”的团结与幸福。

基层善治，需久久为功。下一步，全省人民法庭将以此次命名为新起点，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深入落实第五次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精神和，深度对接乡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推动法庭力量深度融合，多元化解，有序化解，做实定分止争、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城乡发展、保障社会安宁，让新时代“枫桥经验”在祖国北疆黑土地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建设平安黑龙江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合力：北京以市级统筹抽查带动区域协同互查；天津以年度抽查和第三方评估跨越区域约束；河北以省市县三级联动扩大监督覆盖面，共同推进京津冀区域公平竞争审查协同监督。

面对海量政策文件和日益复杂的审查要求，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成为京津冀三地提升审查质效的共同选择。

三地均将数字化、智能化作为提升审查质效的重要途径。北京市依托大数据技术，通过关键词比对识别，对全市10万余件招标文件开展智能筛查，有效扩大审查覆盖范围，显著提升公平竞争审查工作效率，河北省建设“人工智能+公平竞争审查”场景，辅助审查单位提升审查质效，制度实施以来，市场监管部门会同审查重要政策措施1628件，修改调整252件。

从AI智能审查到智能监测场景，从集中审查办公室到线上培训平台，三地以数字技术赋能审查全流程，推动审查模式从人工筛查向智能精准识别转变。

据悉，三地交叉互查以协同机制为纽带形

□ 本报记者 孙天骄

“除近亲属外，倡导农村地区随礼不超过100元，县城区随礼不超过200元。”2026年9月2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4部门联合发布《三江侗族自治县移风易俗倡导性标准》，将农村与县城的人情随礼上限分别设置在100元和200元，一同被划定参考线的还有酒席规模与标准。

给份子钱和酒席划定倡导性标准，三江侗族自治县并非个例。今年9月底，陕西商洛6部门联合印发《商洛市移风易俗“九项举措”倡议书》，人情礼金同样定为“农村不超过100元，城区不超过200元”，同时倡导低彩礼、零彩礼。此前，甘肃兰州高新区也发布《抵制婚嫁陋习弘扬文明乡风倡议书》，倡导“礼轻情意重”，人情随礼不超过100元，不搞“礼金竞赛”，不将随礼金额与亲疏关系挂钩。

近年来，不少地方早已通过村规民约、红白理事会开展人情礼金治理，这些改变有哪些意义？倡导性标准在实践中如何落地？《法治日报》记者采访了相关领域专家。

“人情礼”有了“参考价”

记者注意到，各地划出的“参考线”颇为具体。按照三江侗族自治县的标准，婚事酒席男方各办1天或合办1天，酒席费用每桌控制在600元至800元（含烟酒饮料）以内，婚车数量不超过10辆；除近亲属外，农村地区随礼不超过100元，县城区随礼不超过200元。

商洛的倡议书同样细致：婚丧喜宴农村每桌平均不超过300元，城区不超过600元；农村招待用烟均价不超过10元，城区不超过20元；农村用酒均价不超过50元，城区不超过120元；农村人情礼金不超过100元，城区不超过200元，倡导节俭办事，杜绝铺张浪费。

给份子钱“划线”的背后，是长期累积的人情重负。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靳小怡的课题组曾在关中地区某县抽样调查，发现中西部农村礼金行情呈现出“500元起步”的特征，低收入组人情支出占家庭年总收入的比重，中青年和老年人样本分别达到27.4%和17.37%，比中高收入组高出10至20个百分点。

受访专家介绍，份子钱限高有据可依。乡村振兴促进法第三十条明确要求各级人民政府“推进移风易俗，破除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等陈规陋习”；2019年，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农业农村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力争用3到5年时间使农村陈规陋习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也强调“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

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副教授、陕西省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秘书长高丰美告诉记者，这类倡导性标准有助于推动移风易俗，引导破除“礼金越高情谊越重”的观念，遏制大操大办、“礼金竞赛”陋习，倡导重情轻礼，降低人情消费负担，让居民收入更多投入生产、教育、养老、改善生活，重塑文明乡风民风。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黄振华认为，当前部分地区人情负担较重，人情攀比现象比较突出，尤其对农民群体来说负担更重，也存在铺张浪费的问题。上述倡议书、倡导性标准正是落实中央部署的地方实践，对涵养乡风文明、降低农民负担，破除人情攀比，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不宜采取强制性手段

该如何理解一些地方针对人情礼金推出的倡导性标准的法律性质与定位？实践中是否具有强制性或约束力？

在黄振华看来，此类倡导性标准在性质上属于行政性指导，不具备法律强制约束力，其重点在“倡导”和“引导”，而不是“命令”或“禁止”；它不设定具体的权利义务，不产生法律拘束力，其效力依靠群众的认同与自觉形成。

高丰美认为，可以通过开展广泛宣传教育等方式，创新情感表达形式，如用贺卡、纪念品等替代高额礼金，加强宣传重情轻礼理念，引导群众自觉自愿遵守，让倡导性标准发挥实质效用。

受访专家均表示，相关倡导性标准的落地过程中存在现实堵点。黄振华认为，重点在于“度”的把握。一方面，政府的倡导缺乏法律效力，各地做与不做、做到什么程度，都没有强制约束；另一方面，人情往来属于传统习俗范畴，发挥着表达情感、维系社会关系的现实功能，不是法律所禁止的危害性行为，不宜采取强制性手段。强行设限既不现实，也不符合现代治理的理念和方式，效果未必好。高丰美也注意到，习俗观念根深蒂固，群众观念转变需要一定时间，容易出现表面遵守、私下补礼金的变通做法，这些可能使得相关倡导的落地存在堵点。

份子钱能否参照彩礼进行规制？黄振华直言“很难参照”。他解释说，彩礼涉及的经济利益较大，而且可能关联违法犯罪问题，比如，以彩礼为名的婚骗等现象；高额彩礼还可能带来因婚致贫或因婚返贫的风险。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二条明确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司法解释中重申这一禁止性规定，可见彩礼问题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和司法裁判规则，可以进入法律规制轨道。但份子钱、人情随礼的社会危害没有那么严重，主要是社会风气问题，属于自愿性的礼尚往来，不涉及婚姻缔约的对价，很难上升为法律规制的对象；民法典确立的公序良俗原则，不宜也不应直接转化为对礼金数额的行政强制限制。

加强引导凝聚共识

近年来，不少地方都在探索低礼金、简办酒席的有效举措。例如，据报道，2026年4月，贵州黔东南锦屏县大同乡兴合章山村立下一块石碑，记的是寨里守了十年的规矩——红事随礼12元，白事20元。这个村寨的礼金标准并非凭空而定，而是源于村民的集体商议，从最初按一斤猪肉定价6元，到随物价调整为12元，始终贴合村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不搞“一刀切”，更不盲目攀比。10年来，全村人共同遵守这一约定，没有因礼金多少产生隔阂，反而让邻里关系更加和睦，随礼不再是令人纠结的选择题，不用为“给少了被鄙视，给多了有压力”而烦恼。

在受访专家看来，近年来，移风易俗方面的治理理念逐渐成熟。黄振华指出，移风易俗的关键是激发社会的内生动力。他建议，要加强宣传引导，可以请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等“五老”人员担任宣讲员，在群众中树立典型，请热心群众示范带头；还可以组建红白理事会这类群众自治性组织，依托村民委员会开展村一级的协商议事，把问题摆到桌面上共同商量，形成大家认可，愿意共同遵守的村规民约，这样通过民主协商产生的规则，群众才有认同感，执行起来才有生命力，才能真正实现从“要我遵守”到“我要遵守”的转变。

高丰美认为，在乡村，还可以建设村级公益宴席点、共享厨房，提供平价、标准化的场地与设施，降低简办成本。“随礼有时更像一种社交压力，因此更依赖软性引导与共识凝聚，要加强婚丧观、消费观引导。”高丰美说。

她进一步建议，可以从国家层面出台移风易俗指导意见，将人情攀比治理纳入精神文明、乡村全面振兴等现有政策工具箱；建立常态化长效宣传引导机制，持续扭转旧观念，推广轻量化情感表达方式，选树文明典型；健全多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推动文明办、民政、农业农村、市场监管等部门分工协作，形成合力。

多地发布移风易俗倡导性标准呼吁设置「份子钱」上限 专家建议以村规民约凝聚共识涵养文明乡风